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他国镜像：汉魏晋南北朝镜铭在日本
的传播与文化影响

时嘉艺

JRUCWP2026021

2026. 03. 17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他国镜像：汉魏晋南北朝镜铭在日本的传播与文化影响

时嘉艺

[摘要] 日本弥生至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镜，同时亦有日本本土铸造的铜镜。中国铜镜文化对日本古代文明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持续从中国输入舶载铜镜，更有东渡的中国工匠铸造汉式铜镜，推动了铸镜技术的传播与跨文化交流，并间接促成日本镜工创制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倭制铜镜。舶载铜镜、汉制铜镜和倭制铜镜在形制、图像、铭文方面均存在显著分别，展现了日本对铜镜文化从吸纳到改造的演进轨迹。在百济文化的中介作用下，日本出现了首面原创汉字铭文镜，标志着异国对汉字运用与镜铭创作的突破。古代中日之间在技术、文化层面的交汇与碰撞，以及更广阔的东亚文化网络互动，可从镜铭这一独特载体中得到旁证。

[关键词] 汉魏镜铭；舶载铜镜；倭制铜镜；镜文化传播

在弥生时代日本列岛开始与中国大陆文明发生接触，中国的青铜器及相关冶炼锻造技术随之传入日本。弥生至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来自中国的青铜器及日本生产的仿制器，其中就包括了在中国铸造的铜镜以及日本仿制的铜镜。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铜镜约有 6 000 余面，贵族墓葬中往往随葬几十面铜镜，这些铜镜为研究古代中日政贸往来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表明铜镜文化对日本文明产生重大影响，彰显出当时倭人对镜子的喜好及铜镜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日本除了从中国大规模引进铜镜，也仿照中国镜型进行生产铸造，制作出的铜镜具备鲜明的外来性与本土化的特征。其对镜铭符号的沿袭不仅代表着铸镜技术的传播，也意味着汉字文化圈的扩散。汉镜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一直以来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日本出土的铜镜及其中特殊的铭文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他国镜像，为我们回溯中国镜文化在域外的传播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日本出土铜镜的源流及类型划分

日本列岛的铜镜最初源自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引进、仿制和创新。与中国铜镜多为本土铸造的单一属性不同，日本出土铜镜的来源构成更为复杂：其中既有通过赏赐及贸易直接从中国引入的铜镜，也有东渡日本的中国镜工制造的铜镜，还有本国镜工自行铸造的铜镜。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从中国引入铜镜与本土铸造铜镜的数量占比存在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直观反映了中日政治关

作者：时嘉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Shijiayil119@163.com。

*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明互鉴视域下汉魏六朝铜镜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研究”(TJZWQN25-03)阶段性成果。

系与商贸往来的阶段性波动，更揭示了日本对中国先进铸镜工艺的学习进程与技术自主化演进轨迹。

（一）铜镜东传日本的阶段历程

弥生时代遗址出土的铜镜中，最早的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多钮细文镜。在弥生中期，中日间的交往日益紧密，日本曾多次向中国遣使希望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中国也回赠以印绶和丰厚礼品，《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列传》均有相关记载。彼时汉地铸镜之风盛行，大量汉镜随之传入日本列岛。据下垣仁志《日本列岛出土镜集成》中的数据显示，弥生中期日本出土的中国铜镜种类与西汉中期铜镜类型较为一致，以连弧纹铭带镜、重圈铭带镜、星云纹镜及四神博局纹镜等为主。在以福冈县为中心的北部九州地区，级别较高的墓葬中往往出土数量较多的铜镜。与此同时，日本镜工也开始模拟中国镜型铸造本国铜镜，但制作数量较少，其品质远不能与中国铜镜相较。弥生时代后期，中日交往持续增进，中国铜镜输入量攀升。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朝魏，魏明帝赐其金印紫绶及众多礼品。《魏书·东夷传》载：“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① 在回赠品中，除了传统的丝织品、金、刀等物品之外，还有多达百枚的铜镜。铜镜在日本早期社会中的意义远超实用器具范畴：它既是财富与先进技术的物质象征，又被赋予昭示光明的神秘意涵。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将铜镜作为权力象征分赐地方，后又以之作为祭品随葬于墓中。由此可见，铜镜在当时王权巩固与祭祀仪式中已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与史书记载相印证，这一时期北九州出土中国铜镜的类型以东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为主，数量较多的有云雷纹带连弧纹镜、四神博局纹镜、神兽纹镜及四乳四虺纹镜等。除有中国铜镜被源源不断输入日本之外，中日之间也不乏人员往来，《吴志·华覈传》记载：“昔海虜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于往年。”^② 《吴书·孙权传》又载吴国将领曾遣数万人前往日本：“（黄龙）二年（230）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③ 亶洲是当时日本列岛的组成部分，这些前往亶洲的人群为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与铸镜技艺。至古坟时代，据《宋书·夷蛮传》记载，倭五王在413年至478年间，至少有九次遣使南朝献贡的经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汉人为了躲避战乱远渡日本，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从出土文物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铜镜集中出土于倭国的近畿区域，出土铜镜类型与三国两晋时期的铜镜相仿。日本的铸镜技术也臻于成熟，除模仿中国镜外，还生产出鼉龙纹镜、珠文纹镜、橐龠纹镜、捩纹镜、素纹镜、铃镜等具有本国特色的铜镜。但受南北朝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影响，中国铜镜制造业衰退，日本引入中国镜数量持续减少，倭五王时代后中日官方交往中断。古坟时代后期，日本铜镜产出虽仍维系一定规模，但数量显著下降，6世纪后半叶古坟中汉式镜已十分稀少。

尽管史书中对公元前2世纪至6世纪中日交往的记载内容有限，但日本出土的丰富铜镜充分印证了中日之间经东部海陆丝绸之路的政贸往来情况。弥生后期与古坟前期，是日本引进、生产铜镜的两个重要时期，不仅有大量中国铜镜被运载至日本列岛，还有部分中国镜工在异国从事铜镜铸造。倭人在接受这些舶来品的同时，也实现了对铸镜技术的引入，生产出具有本国特色的铜镜。

（二）日本出土铜镜的类型划分

日本学界一般将弥生至古坟时代的日本出土铜镜划分为舶载镜与倭制镜（又称仿制镜）两大类

^①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东夷传》，857页，中华书局，1982。

^②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卷六十五《王楼贺韦华传》，1465页，中华书局，1982。

^③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吴主权》，1136页，中华书局，1982。

型。舶载镜指通过贸易与官方馈赠从中国引入的铜镜，花纹、铭文与中国本土铜镜别无二致。倭制镜为日本工匠模仿中国镜制造，在形制、纹饰、铭文方面与中国镜差异显著，表现为形制更改、花纹粗疏、铭文稚拙。在冈崎敬编著的《日本における古镜発见地名表》（1976—1979年）、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著的《日本出土镜データ集成2——弥生・古坟时代遗迹出土镜データ集成》（1994年）《补遗》（2002年）以及下垣仁志编著的《日本列岛出土镜集成》（2016年）中均依据考古资料对弥生-古坟时代日本各地铜镜的出土状况进行统计。目前以《日本列岛出土镜集成》的统计数据较为全面，该书详细记录了日本全域及韩国部分地区出土铜镜的遗址、时期以及铜镜的类别、铭文，共收录铜镜6313面^①，其中可明确的日本出土铜镜为5942面。在6000余面铜镜中，舶载镜数量为2250面，倭制镜数量为3233面。

这些数据能够作为研究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镜及镜铭的重要补充资料，但下垣仁志将500面左右的三角缘铜镜归为舶载镜，学界对此存有争议。中日学界对于三角缘铜镜等特殊镜类的产地问题已有长期而深入的探讨，其结论动摇了传统的二分法。日本学者森浩一提出三角缘神兽镜可能是渡来工匠所制^②，王仲殊明确其为三国吴地镜工在日本铸造。除三角缘神兽镜外，白云翔亦确认部分大型连弧纹镜为东汉晚期洛阳镜工东渡后铸造。尽管镜工来源属地仍有商榷空间^③，但中国工匠在日本铸镜已为学界共识。这类铜镜遵循汉代铜镜形制，却在镜缘、尺寸等细节上呈现出异于中国本土铜镜的风貌，因此有必要在传统二分法基础上，增设“汉制铜镜”类别，特指东渡日本的中国镜工在当地铸造的铜镜。故而，关于日本出土铜镜的分类，宜调整为：来源于中国的舶载镜、在日本本土由汉人镜工铸造的汉制镜，以及由倭人镜工仿制生产的倭制镜。这三类铜镜的形制、纹饰、铭文存在联系密切而又各自鲜明的特点。

当前学界对日本铜镜的研究聚焦于出土遗迹考察与纹饰型式学研究，从镜铭角度分析的成果较少，仅有孙赛雄硕士论文《日籍中的汉魏铭文镜汇编》简要总结相关特点，但其没有对出土品和收藏品铜镜加以区分，也并未对舶载镜铭、汉制镜铭、倭制镜铭进行分类。因此，有必要总结日本出土各类汉魏晋南北朝铭文镜的特点，探析其传播过程与文化影响。

二、舶载铜镜铭文的典型特征

日本出土的舶载铜镜直接源自中国，弥生中期至古坟后期出土铜镜的分期及类型与汉魏时期铜镜基本一致，故而舶载铭文镜的特点之一，就是其镜铭主要类型及内容未脱离中国镜铭系统，但存在部分铭文类型滞后及缺失现象。

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铜镜铭文重复率高，但鲜有大小、花纹与铭文完全相同的铜镜，各镜铭文或缺一句或衍一字，可以用大同小异来概括。日本出土舶载铜镜铭文与中国本土铜镜铭文在内容、字体风格上无本质区别，但受中日贸易开展时间较晚、交通阻隔及铜镜流传周期长等因素影响，古坟

^① 下垣仁志在《日本列岛出土镜集成》中指出，虽然已尽可能做到全面搜集，但为避免出现遗漏现象，先推定日本列岛出土镜的数量在6000面左右比较稳妥。

^② 三角缘神兽镜的产地问题是中日学界持续数十年的论争焦点。综观学术史，先后出现以下几种主要学说：最早由富冈谦藏提出“魏镜说”，认为其乃曹魏赐予倭王的“铜镜百枚”；作为补充，小林行雄提出“特铸说”，主张此为曹魏为外交目的特铸之镜。随后，森浩一提出“渡来工匠制作说”，认为三角缘铜镜系外国工匠在日本所制。王仲殊在此基础上确立“吴镜说”，论证其为东渡日本的吴地工匠所造，此说对“魏镜说”构成有力挑战并产生深远影响。此外，近年来徐坚提出“辽东说”，认为三角缘铜镜的制造来源与辽东地区关联密切。尽管中国洛阳等地曾有近似镜出土，但这些铜镜能否归入经典三角缘神兽镜体系，学界尚未形成共识。鉴于迄今在中国境内未发现无可争议的同类镜，本文采纳学界主流观点之一，即三角缘神兽镜并非舶载镜，而是由东渡的汉人镜工在日本铸造的。关于镜工来源地，笔者赞同汪俊明曾提出的观点——三角缘铜镜的制造可能经历了从吴地工匠主导到曹魏工匠参与甚至主导。在此基础上提出“多源地说”，三角缘神兽镜的纹饰、铭文呈现出“亦魏亦吴”的混杂特征，正反映了3世纪东亚人员、技术与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出土铜镜类型无法与中国同期保持一致，铭文镜种类亦不如中国丰富。鹏宇在《汉镜铭文汇释》中统计了中国铜镜约有 240 种主要的铭文类型，而日本出土铜镜的铭文类型要小于该数量，仅涵盖了主流铭文镜类型。例如弥生中期墓葬中的舶载镜多见西汉中期的铭文类型，没有见到西汉早期的铭文，缺失铭文诸如西汉早期流行的“长相思、毋相忘”铭、“秋风起，予志悲”铭、“与天相寿，与地相长”铭等。此外，还缺失了部分产量较少、内容独特的铭文镜类型。又如王莽时期中国镜铭中多有涉及新朝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内容，但此类铭文镜在日本存在的数量极为罕见，仅见少量“王氏作镜四夷服”铭铜镜。这些有限的铭文镜意味着当时王莽新朝的影响虽已经波及到遥远的日本，但有特定政治意义的铜镜多面向中国境内流通，由于王莽政权的短暂存续及轻四夷的外交政策，新朝政权与日本列岛之间的政贸活动有所减弱。再如东汉时期中国铜镜中已出现姓氏铭文镜，但直至三国时期此类铜镜才传播至日本，且舶载铭文镜中姓氏铭的类型丰富程度要远低于中国，目前中国镜中的姓氏铭数量约为 90 种，而舶载镜中姓氏铭仅有 15 种。弥生末期的平原坟墓曾出土 9 面“陶氏作镜”铭四神博局纹镜，表明该批铜镜集中生产自陶氏工坊。而除此之外，其余姓氏铭文镜数量很少且出土地点分散，或许意味着从私人工坊集中订购舶载镜的情况较少出现。

舶载铭文镜的特点之二，是其在日本墓葬中出土的类型相对集中。汉代之后一墓随葬一镜的现象较为常见，富有的墓葬会增加铜镜数量，但一墓随葬 10 面以上铜镜的情况尚属个案，仅有山东平度界山墓葬中墓主周身覆盖 19 面铜镜。但在日本贵族的墓葬中批量葬镜现象却普遍存在。在弥生时代中期，北九州地区级别较高的墓葬中往往出土数量较多的特定铭文镜类型，例如福冈县糸岛市三云南小路遗迹 1、2 号瓮棺墓墓主为伊都国国王及王妃，其中 1 号瓮棺墓中随葬 34 面铜镜，包括 11 面“清白”铭连弧纹镜和 6 面“昭明—清白”铭重圈铭文镜；福冈县春日市须玖岡本遗迹 D 地点出土 3 面“清白”铭连弧纹镜、2 面“昭明”铭连弧纹镜和 5 面“昭明—清白”铭重圈铭文镜，其墓主为奴国国王。弥生后期福冈县糸岛市平原坟墓中棺外出土 40 面铜镜，其中有 2 面“长宜子孙”铭连弧纹镜、22 面“尚方作镜真大巧”铭四神博局纹镜及 9 面“陶氏作镜真大巧”铭四神博局纹镜，据推测平原坟墓墓主为伊都国的女性国王。在古坟前期，近畿地区成为拥有铜镜的中心地区，例如奈良县大和天神山古坟中出土铜镜 23 面，其中有“尚方作竟真大巧”铭四神博局纹镜、“长宜子孙”铭连弧纹镜等 15 面铭文镜，天神山古坟中并无遗体埋葬痕迹，东面紧邻崇神天皇陵，因此学者认为其可能是埋葬崇神天皇陵遗物的陪冢。墓葬中随葬铜镜的数量能够反映出墓葬等级及墓主人身份，数量较多的陪葬铜镜被统治阶级集中占有掌控，凸显其享有财富及权利的优越性。而在级别较高的墓葬遗址中出现大量特定类型的铭文镜也可能体现出墓主人的偏好，表明日本从中国引入的舶载镜是批量化且是有选择性的。

三、汉制铜镜铭文的差异化书写——以三角缘铜镜为例

本文所称的“汉制铜镜”，特指由东渡日本的中国镜工所铸造的铜镜。这类铜镜工艺精良，形制上基本遵循中国传统，但在镜缘、尺寸、纹饰、铭文等细节上又展现出明确的差异特征。由于汉制镜与舶载镜面貌相近，对其类型认定一直是学界难点。目前，较为明确的汉制铜镜包括弥生后期福冈县平原村 1 号坟丘墓出土的 5 面大型连弧纹镜，以及古坟前期大量出土的三角缘铜镜。后者尤为典型，与中国神兽镜的区别在于其有着高尖三角缘、笠松形纹样、特定图像组合及镜铭变体，是探讨汉制镜铭文特征的理想样本。

日本出土三角缘铜镜数量有 500 余面，铭文镜的数量约在 300 面，其铭文沿用了中国本土铜镜铭文的基本句式和行文结构，但部分内容又与习用套语存在出入，在书写内容、用词习惯、纪年方式乃至作镜者的自我表述方面，均表现出与舶载铜镜显著不同的特点。舶载镜铭文基本与中国本土镜铭保持一致，可视作汉镜文化的直接移植；而汉制镜铭文则在模仿中发生变异，体现出工匠在异

域环境中的适应性与创造性。以下从两个方面对二者进行对比辨析。

首先是铭文内容的改易与创新。三角缘铜镜铭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铜镜的方格纹饰内重复罗列祈福短语，内容与中国铜镜铭文一致，多为“天王日月”“长宜子孙”“君宜高官”。另一种是在铜镜的铭文带中铸刻篇幅较长的铭文，约有100余面铭文镜的内容与中国铜镜铭文存在差异。例如很多三角缘神兽镜铭将中国镜铭中常见的“吾作明（明）竟（镜）真大好”改为“吾作明（明）竟（镜）甚大好”^①，“甚”字在汉镜中少见，但频繁出现于魏晋镜及三角缘神兽镜。将中国镜铭中的“幽涑三刚”改为“幽律三刚”^②，此处“律”字应指（铸镜的）规则、法度。又如将中国镜铭中的“上有仙人不知老”替换为“上有神守（兽）及龙席（虎），身有文章口衔巨”^③“上有百鸟不知老，今为青竟（镜）日出卯兮”^④“上有王乔以赤松，师（狮）子天鹿（禄）其（麒麟）葬（麟）龙”^⑤。另有镜铭“仙人王乔赤松子，师（狮）子辟邪世少有”^⑥“惟念此竟（镜）有文章，卖者老寿为侯王，上有申鸟在中央”^⑦等，也未见于中国镜铭之中。三角缘铜镜铭文中多见百鸟、狮子、辟邪、麒麟各类神兽，而中国出土镜铭中则较常见传统的四神形象，仅有部分私人作坊所铸镜铭中会采用狮子、辟邪等异兽，从未见到百鸟、麒麟形象。可见铸造三角缘铜镜的工匠为铭文注入了新的内容，不再完全遵从中国镜铭的常见惯例。

其次是镜工自述身份经历的内容与纪年方式的错位，此类内容未见于中国镜铭中。例如滋贺县大津市织部山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铭文为：“新作明（明）竟（镜），幽律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⑧标明铜料产自徐州、工匠来自洛阳。岛根县云南市神原神社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铭文：“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⑨京都府福知山市广峰15号坟出土三角缘盘龙镜铭文：“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作镜。”^⑩群马县高崎市蟹沢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铭文：“□（正）始元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自荆（州）师。”^⑪首句采用魏国纪年，景初为魏明帝年号、正始为魏齐王年号，铭文二至四句陈述镜工身份，“本是京师”“本自（州）师”指铸镜工匠来自于魏国都城洛阳或魏国所辖某州，依据这些铭文有助于确定镜工身份。又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远渡日本的镜师并不能及时了解中国改换年号的消息，直至正始元年中国带方太守赴邪马台国，方才获知新帝继位的情况。又如大阪府柏原市国分茶9山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铭：“吾作明（明）竟（镜）真大好，浮由天下□（敖）四海，用青同（铜）至海东”^⑫，滋贺县野洲市大岩山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铭文是：“镜陈氏作甚大工，刑暮周刻用青同（铜），君宜高官至海东”^⑬，其中“海东”泛指中国以东的地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⑭此处海东指代高句丽一带，而镜铭中的“海东”很可能是对日本的代称。故而由上述镜铭可以做出推测，洛阳陈氏镜工东渡日本后继续从事铜镜铸造，并将自我身份经历融入铭文之中，创造出与中国本土镜铭迥然不同的内容。在中国本土镜铭中，“铜出徐州”的铭文仅见于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魏晋墓中所出的一枚铜镜，铭文是“吾作大竟（镜）真是好，同（铜）出余（徐）州清且明兮”^⑮，而“师出洛阳”“本是京师”“用青同至海东”等铭文则不见于任何中国境内的铜镜。通过上述内容比对可以发现三角缘铜镜铭文依托中国铜镜铭文的模板而作，但二者具体内容又存在差异，未能在中国镜铭中找到可对应的篇目类型，这些铭文是在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产生的、具有新的叙事性内容的文本变体，其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下垣仁志：《日本列島出土鏡集成》，136、40、82、40、154、172、226、174、128、278、142、14、178页，同成社，2016。

⑭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东夷传》，842页，中华书局，1982。

⑮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工作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12）。

中融入了诸多铸镜工匠的独创元素及自述经历，这一差别正是判定其独立于舶载镜的关键依据。

四、倭制铜镜铭文的拟铭与真铭现象

日本虽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汉镜输入和流布，但并不满足于铜镜成品的引进，早在弥生时代中后期，就发展起本国的铸镜产业，其产业很可能是在来自魏晋乐浪、带方郡的镜工辅助下建立，由本国工匠生产出模仿汉镜形制的倭制镜，产品主要服务于皇室贵族。倭制镜与中国镜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倭制镜类型是在各式中国铜镜纹样的基础之上加以简化、变形而构成的独特样式，其与中国镜在工艺、纹饰、铭文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例如在铸造工艺方面，中国镜工通常采用陶范或泥土范的铸镜方式，技术水平较高，而在弥生时期，日本镜工仍保留了传统的石范铸镜技术，所铸部分铜镜较为粗劣；在镜质方面，由于中国镜的合金成分比例更为合理，质地相对坚硬致密，而倭制镜的合金配比尚未能稳定掌握，导致镜体在硬度和光泽度上有所不及；在尺寸方面，早期倭制镜大多是直径 10 厘米以下的小型镜；在纹样方面，倭制镜多将镜背纹饰简单化和抽象化，对中国镜的图像只有形式上的效仿而无本质上的接受，导致其含义较难理解；在铭文方面，很多倭制镜存在模拟汉字的拟铭带现象，少数倭制镜出现了独创性铭文。上述特点是区别倭制铜镜与舶载铜镜、汉制铜镜的重要参考标准，倭制铜镜在诞生之初虽简质粗陋，但也在尝试不断改良，镜中的拟铭和真铭现象体现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对汉字不同程度的接纳。

在有铭文带装饰的倭制镜中，拟铭现象较为常见。由于日本接受并使用汉字的时间较晚，倭人镜工对汉字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十分有限，无法对汉镜铭文做出准确的辨识，故而仅能模拟铭文，将汉字改造为各种纹饰符号铸刻于镜背之中。弥生中期至后期的倭制镜主要模仿西汉时期的连弧纹镜和圈带纹镜，倭制镜中的拟铭多以近似于“日”“月”“之”文字的简化符号或涡纹、线纹等花纹替代中国镜铭带中原有的“日光”“昭明”等铭文带。现举典型例证如下：目前日本境内最早的一面倭制铭文镜，是出土于弥生后期福冈县筑紫野市贝元遗迹 312 号住居的连弧纹镜，其形态与中国的连弧纹镜相似，但将铭文部分变为几何状花纹。此外，福冈县朝仓市大庭久保遗迹 29 号棺木出土的连弧纹镜中有四个拟铭字符，其中有近似“之”字的符号（图 1）；佐贺县三养基郡五本谷 25 号土坟墓出土的圈带纹镜中有近似于“日”“月”的简化符号（图 2）；熊本县五丁中原遗址出土的圈带纹镜，其拟铭带中用涡纹等其他符号填充，也有对于“之”字形体的模仿（图 3）；广岛县安佐北区真龟 C 地点遗迹 3 号住居出土的圈带纹镜有“日”形和涡纹间隔组成的拟铭（图 4）。这种简化方法很像日本在学习汉字之初用假名来表記汉字、代替真名的造字方法，而这种方法虽然简便易行，却对镜铭真实意义的表达出现巨大偏差，此类模拟文字形态的符号失去表意功能而主要发挥装饰性能。



图 1 大庭久保遗迹 29 号棺木出土的连弧纹镜^① 图 2 五本谷 25 号土坟墓出土的圈带纹镜^②

①② 南健太郎：《弥生时代九州における漢鏡の流入と小形仿製鏡の生産》，载《熊本大学社会文化研究》第 5 卷，2007。



图3 五丁中原遗址出土的圈带纹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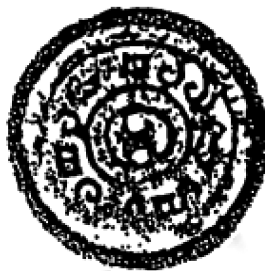


图4 真亀C地点遗迹3号住居遗迹出土的圈带纹镜②

在古坟时代，倭制铜镜的类型发生变化，连弧纹镜、圈带纹镜数量减少，出现了神兽镜、兽形镜、四神博局镜、鼉龙镜、珠纹镜、橐龠纹镜、捺纹镜、素纹镜、铃镜等诸多镜型，由于铸镜技艺的提高，部分镜的造型纹饰看似趋近中国铜镜，但仍存在一定差距，无论是模拟中国纹饰的镜类，还是具有本国特色纹样的镜类均存在拟铭带现象，多以细线勾勒出几何纹样来模拟文字。例如静冈县出土的神兽镜（图5），拟铭带为细线组合出的类文字符，京都县相乐郡大福寺古坟出土的鼉龙镜（图6），拟铭带中有鱼纹状、格纹状的花纹。京都县向日市寺户大塚古坟出土的四神博局镜（图7），拟铭带为涡纹和细线组合而成。尽管铸镜工匠试图用线条符号来拟合汉字铭文的字形特征，以圆润的涡状符号来模仿小篆或用平直的线条模拟隶书，但多数拟铭已失去文字正态而无法释读，不再具备原本的表意功能。形式多样的拟铭现象表明汉字在日本最初的传播是作为一种纹饰符号被模仿，还没有内化为一种的书写系统。



图5 静冈县出土的神兽镜③



图6 大福寺古坟出土的鼉龙镜④



图7 寺户大塚古坟出土的方格八兽镜⑤



图8 一贵山桃子冢古坟出土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⑥

①② 南健太郎：《弥生时代九州における漢鏡の流入と小形仿製鏡の生産》，载《熊本大学社会文化研究》第5卷，2007。

③ 樋口隆康：《古鏡図録》，图版172、镜345，新潮社，1985。

④ 樋口隆康：《古鏡図録》，图版167、镜335，新潮社，1985。

⑤ 樋口隆康：《古鏡図録》，图版154、镜311，新潮社，1985。

⑥ 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編：《3次元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古鏡総覧（I）》，430页，学生社，2006。

除拟铭铜镜外，古坟时期的墓葬中还出现了一些铸刻特殊汉字铭文的铜镜。在古坟时代前期，佐贺县东松浦郡谷口古坟、福冈县糸岛郡一贵山桃子冢古坟、大阪府柏原市国分又谷北塚古坟共出土5面倭制三角缘神兽镜（图8）。铜镜内区外侧的铭文带上所刻“吾作明（明）竟（镜）甚独，保子宜孙富无皆，奇”^①的铭辞，其字句仿自古坟前期静冈县松林山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铭辞“吾作明（明）镜甚独奇，保子宜孙富无譬”^②，但倭制三角缘神兽镜的铭辞存在次序错误，且文字都是左右相反的。此外，奈良县北葛城新山古坟出土的1面倭制方格四神规矩纹镜，铜镜中心为圆钮配四叶钮座，钮座外的方格内顺时针镜铭为语序错置的十二地支铭“子（？）申子酉巳午未辰（？）寅午”^③，其中“申”字与第二个“午”字形体上下倒置；方格外的主纹饰为密置的动物纹与博局纹，动物纹与中国的四神形态存在差别；博局纹中的“L”形的方向与舶载镜中的“L”形相反；铜镜外区为半圆方格铭带、锯齿铭带、拟铭带和菱云纹带，但半圆方格铭带中原本应有文字的部分用涡纹代替，拟铭带中为难以辨识的刻画符号。另有新潟县南鱼沼市饭纲山10号坟出土土珠文镜上带有“大日大日大日大日大日”^④重复的铭文符号，但并未构成完整的语句。复刻有清晰汉字铭文的倭制镜数量极少，从这些铭文中语序错乱、文字倒置等现象可以看出上述几面倭制镜很可能模仿同类的汉制镜或舶载镜，但未能将铭文很好复原，表明当时的铸镜工匠对汉字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十分有限，且铸造者和使用者均并不十分在意铭文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虽然在日本造镜之初，拟铭现象较为普遍，但镜铭及其所表征的中国文化还是被日本接纳吸收，工匠逐渐将真铭融汇于铜镜当中。在古坟中期，墓葬中还出土过几面带有刻画汉字铭文的铜镜，京都县幡枝古坟出土的1面四兽镜镜体周缘刻有“夫火竟”^⑤的汉字铭文，与之类似的还有宫崎县持田25号坟出土的四兽镜侧部也刻有“火竟”^⑥铭文，镜铭含义应指铜镜可聚日光取火，功能类似于阳燧。这两面铜镜的铭文并非直接浇铸而成，而是在铜镜铸成后刻画在上面的。其铭文线条较为粗糙，但字形完整、表意准确，表明刻画者应对汉字意义和铜镜功能有一定的了解，这些文字较从前粗疏的纹饰符号类拟铭有明显的进步。

汉魏铜镜的东传为日本铜镜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在技术层面，日本引入中国铜镜时，已超越单纯的实物获取阶段，转而聚焦于铸镜工艺的系统学习，这一转变推动日本铸镜产业实现了关键性进步；在文化层面，随着带铭铜镜的传入，倭人较早通过金石载体接触到汉字系统，依据这些铜镜材料可以获知当时倭国境内汉字的书写方式和样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知汉字在当地的受众人群和传播境况。然而，受限于当时倭人对汉文的认知水平，这些镜铭多被视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日本镜工仅能对其进行粗略模仿，以纹饰符号的形式传递特定意涵。尽管东渡日本的中国工匠延续了铸造铭文的传统，并为日本镜工提供技术辅助，却仅生产出少量带铭汉式铜镜，镜铭书写的完整传统未能在日本得到延续。倭制铜镜中铭文的符号化现象，标志着铭文所承载的文学内涵与文化意蕴逐渐消解，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日本对中国铜镜的接受，也反映出其对中国镜文化传统的选择性改造。

五、百济主导下的异国镜铭初创

在汉字系统性地传入日本之前，中国铜镜铭文已作为先导，为日本社会提供了接触和感知汉字的初始实物载体。然而，直至古坟时代中期，日本并未自主创作出完整的铜镜铭文。这一局面的突破，终于通过百济这一重要中介得以实现。现存于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神社的人物画像镜，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物证。

^{①②④⑤⑥} 下垣仁志：《日本列島出土鏡集成》，178、92、48、148、468页，同成社，2016。

^③ 樋口隆康：《古鏡図録》，图版152、镜307，新潮社，1979。

该镜相传出土于妻古坟，其主纹饰区由骑马、舞袖、吹笛、行礼等几组人物图像构成（图十），铭带区铸有 48 字铭文：“癸末年八月日，十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斯麻念长寿，遣开中费直、秽人今州利二人等，取白上同（铜）二百早（贯），作此竟（镜）。”^① 关于铭文中“癸末年”的具体纪年及“十大王年”的隶定问题学界尚存在争议，现有西田长男的“323 年说”、水野祐的“443 说”、福山敏男和古田武彦的“503 年说”几种说法，目前以“503 年说”认可度较高。铭文可大致释读为：癸末年八月，男大迹王（即位前的继体天皇）在意柴沙加宫（忍坂宫）之时，百济斯麻（武宁王）为祈求王的长寿，遣开中费直、秽人今州利二人等，取上好白铜二百贯造此镜。铭文清晰地表明此镜是在百济武宁王的授意下，为献给倭国国王而特制的礼品。

尽管有学者因出土地点而将其归为倭制镜或仿制镜序列，但倭国此前还从未出现过铸刻有汉字形态完整、独立成篇铭文的铜镜。从该面铜镜的主要纹饰来看，其模拟自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流行的人物画像题材，由于在日本其他地区也出土过类似纹饰的铜镜，有研究者推测这有可能是翻铸镜。镜铭的主要风格与传统的中国镜铭迥然不同，其字形亦篆亦隶，还出现了反字、笔画排布存疑及较难辨识的字体，其中“年”“大”“遣”“费”均为明显反字。铭文并未全部采用汉语惯用词汇，其中“意柴沙加宫”是日语“忍坂宫”的音译汉文写法。铜镜的铸造者“开中费直”“秽人今州利”也并非汉人常见名称，“秽人”指的是古代分布于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一支部族，他们应为百济人或来自百济的汉人移民后代。这面铜镜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日本列岛首次出现的带有原创性汉字铭文的镜，彻底突破了此前倭制镜拟铭符号化、铭文错乱的局限。虽然从字形书写角度来看工匠对汉文的掌握并不十分熟练，但该铭文完整呈现了外交意图、人物关系与制作流程，其语言叙述顺序遵循汉语逻辑，显示出铸造者具有初步的汉文水平，也表明百济及倭国对汉字的接受已从视觉模仿走向功能运用。



图 9 和歌山县桥本市的隅田八幡神社藏人物画像镜

这面镜子的诞生，深刻揭示了百济在东亚文化传播中的中介作用。百济与倭国关系密切，长期向其系统性地输出源自中华文明的典籍、器物与技术。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在位期间，百济向倭国赠送七支刀和七子镜：“秋九月丁卯朔丙子，（百济使者）久氏等从千熊长彦诣之。则献七枝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种种重宝。”^② 《日本书纪》成书于 720 年，是时人对日本早期历史的追溯和建构，《书纪》中对早期天皇的称谓及纪年并不准确，但其中所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两国人员往来、物品交流的史实。在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也发现了七支刀的原型，刀身两面有

① 下垣仁志：《日本列岛出土镜集成》，260 页，同成社，2016。

② 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132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60 多个字的金嵌铭文：“泰□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炼钢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供侯王，□（永）□（年）□（大）□（吉）□（祥）。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子奇生圣德，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① 叙述百济王命人制造七支刀赠与日本之经过，刀铭的书写形式与冯云鹏《金石索》中所记的一则元嘉年间所铸刀铭十分相近，表明七支刀的铸造者对汉文化有较为详熟的了解。此后，这种物质及文化的输出更以常规制度化的形式进行。《日本书纪》还记载，应神天皇在位期间，来自于百济国的阿直岐、王仁先后来到倭国，为贵族系统传授汉字与中国典籍。《书纪》中称：“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② 至继体天皇时期，百济先后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高安茂赴日，标志着儒家经典通过官方渠道系统性传入日本。至钦明朝，百济更是向日本输出了佛教以及包括历法、医学、易学在内的各类技术专家：“（钦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喇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钦明天皇十五年）二月……别奉勅，贡易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俊陀、采药师施德潘量豊、固德丁有陀、乐人施德三斤、季德已麻次、季德进奴、对德进陀……”^③ 由此可见，隅田八幡神社的人物画像镜，并非一件孤立的贡品，它是百济在政治、宗教、技术等领域对倭国进行全方位文化输出的有机组成部分。百济不仅主动地接受中华文化在本国的深耕厚植，更不断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与文化资本，用以经营与倭国的关系。中国铜镜能够跨越地理阻隔与社会壁垒，深度影响着周边区域的文明进程，已成为连接东北亚各国的重要纽带，印证了汉文化在古代东北亚文明交流中的引领作用。

自弥生中期至古坟末期，汉魏晋南北朝铜镜在日本的传播经历了至少 7 世纪之久，深刻影响着日本的铸镜产业及铜镜文化。日本的铜镜铸造也经历了由引进、模仿再到创造、革新的演进路径，通过追溯不同历史时期日本舶载铜镜、汉制铜镜、倭制铜镜的出土情况，可以获知中国铜镜传入日本后，镜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及宗教功能，其作为威仪象征物品的属性被放大。进一步梳理各型式铜镜铭文之间的差别，能够发现汉制镜的铭文呈现出独特的过渡性与创造性：它既保留了中国镜铭的文体框架，又嵌入了工匠的东渡信息与本地化的神兽意象，成为记录早期东亚人员流动与文化适应的金石文献。多数倭制镜呈现出重纹轻铭的倾向，虽模仿了中国镜的纹饰，却将铭文简化为拟铭符号，传统中式镜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意涵被逐渐淡化。从倭制铜镜制作技艺提升与铭带完全退化这一相反现象能够看出，日本对铜镜铸造技术的吸纳和对铜镜铭文中蕴含思想文化的接受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步性。在铜镜东传的历史进程中，百济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百济王授意下制造的隅田八幡神社人物画像镜实现了从对汉字的形式模仿到功能性书写的关键跨越。综上所述，汉魏晋南北朝铜镜在日本的传播与演变，不仅是一部器物与技术的东传史，更是一面映照古代东亚文化关系的“他者之镜”。它既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辐射力，也揭示了如日本、百济等周边民族在文明对话中的主体性与选择性，透过古代铜镜可一窥古代东亚各国之间在技术层面的互动与交流，以及在文化层面的交汇与差异。

① 宫崎市定：《谜一般的七支刀》，100 页，中信出版社，2018。

② 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141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③ 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265、268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The Dissemination and Cultural Impact of Bronze Mirror Inscriptions of the Han,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Japan

SHI Jiayi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burial sites of Japan's Yayoi to Kofun period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bronze mirrors dating back to the Han,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s in China have been unearthed, alongside bronze mirrors produced locally in Japan. Chinese bronze mirror culture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Japanese civilization. Japan continuously imported bronze mirrors from China, while Chinese craftsmen who traveled eastward also cast Han-style bronze mirrors in Japan,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mirror-casting techniques and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indirectly contributing to Japanese mirror artisans creating indigenous Japanese-style bronze mirrors. Imported mirrors, Han-style mirrors, and Japanese-style mirrors exhibit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form, imagery, and inscriptions, revealing Japan's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rom absorption to adaptation in bronze mirror culture. Through the cultural mediation of Baekje, the first bronze mirror with original Chinese-character inscriptions emerged in Japan, marking a breakthrough in the adop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reation of mirror inscriptions outside of China. The converge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Japan i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broader dynamics within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network, can be corroborated through the distinctive medium of mirror inscriptions.

Key words: Mirror Inscriptions; Imported Bronze Mirrors; Japanese-style Bronze Mirrors; Dissemination of Mirror Culture